

引 言

本卷起自 1956 年 4 月至 1966 年 4 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

这个历史时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面前，党和国家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1966 年同 1956 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 3 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 1965 年起中国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国家的工业布局有了改善。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高新科技和国防工业在这个时期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逐渐取得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化肥施用量都增长 6 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 70 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 4.9 倍，各级教育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在这十年，党和国家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中共八大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正确揭示和规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 1957 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

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思想理论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和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也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期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对于这十年的工作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国家的性质，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随后，又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缺点是忽视了客观规律。在贯彻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国情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中共中央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这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

从1960年冬起，党和政府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认真落实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它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指明了方向。

但是，这一时期“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还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

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事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1965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虽然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这个时期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成为后来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

结 束 语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课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遵循，必须在实践中通过艰苦的探索才有可能获得。这年4月初，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①这个重要思想，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十年。这十年，是正确与错误、成就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十年，是犯了严重错误又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挫折与错误，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重大的成就，也是在探索中包括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取得的。正是在这种曲折前进的过程中，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奠定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基，为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最大成就，是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首先，建成了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能源工业方面，电力工业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联结成网；煤炭工业稳步向现代化发展；石油在1965年实现自给。冶金工业方面，钢品种1964年达到900个，钢材品种达到9000个，都比1957年增加1倍多；过去不能炼制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等，都能自行炼制了。机械工业方面，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体系；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国产的纺织机械不但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新兴的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也在这个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其次，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经济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从1958年到1965年，建成了531个大中型工业项目；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如武汉、包头等十大钢铁公司在内的重要企业，一批重要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及生产规模达到1000万吨的大庆油田等。1965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近1倍。工业经济效益和技术经济指标有很大提高。再者，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在充分利用和发挥沿海工业基地作用的同时，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得到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也取得重要发展。还有，交通运输获得很大发展。全国新增铁路通车里程7200多公里，建成或部分建成了12条干线。全国除西藏外，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有了铁路运输。公路和邮电通讯事业也有很大的进步。

在农业方面，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从1958年到1965年，大中型水利建设施工项目达到290多项，其中建成的有150多项，淮河、黄河、海河等的几大水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治

理。灌溉面积在全国耕地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4%上升到1965年的32%；机耕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的比重由2.4%上升到15%；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中的比重由4.4%上升到24.5%；每亩耕地的用电量由0.1度上升到2.4度，化肥用量由0.5斤上升到2.5斤。同时在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建立农业气象预报和发展农村小工业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也取得很大进展。从1958年到1965年这八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达到119.5万人，是前八年的3.6倍。科学技术人员也成倍增加。1965年全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从1952年的12.64%提高到17.89%。邓小平同志肯定了对17年的估计问题。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①

这里应当指出，在经济建设中虽然出现过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并且在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中又因庐山会议后期错误批判彭德怀而引发更大的挫折，但从1960年冬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集中全力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等领导人带头节衣缩食，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经过五年调整，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这是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毫无疑问，这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前所未有的的一大步，成为中华民族继续前进的重要起点，这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方面。当然，我们在如实地肯定这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的时候，决不讳言在这同时也犯了错误，经历了挫折，这些错

^① 《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误和挫折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是巨大的。这些错误概括地说，主要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在本卷的相关章节中都作了如实的叙述和必要的评析，广大读者会从这里看到探索人民共和国的建设道路的艰巨性，从而深切体会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为改变祖国的贫穷面貌所付出的艰辛。很显然，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过程中要求不犯一点错误，不经历一点曲折，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之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这个时期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而有益的。

第一，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党和国家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对此，毛泽东在一个时期的认识是比较清醒、比较自觉的。他多次强调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959年底，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所处的阶段问题，他明确提出要通过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边”，即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问题。他据此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962年他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①毛泽东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观点，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很有创见的丰富和发展，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他还指出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不仅有效地指导了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而且也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内的骄傲情绪急剧膨胀起来。这种骄傲情绪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不顾国情国力，片面强调高速度，要求在短期内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种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和做法，又反过来要求改变生产关系，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把小集体所有制变为大集体所有制、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急于把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也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因此，一切决策必须从国情出发，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应同中国的国力相适应，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

第二，要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共和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9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变化，“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和发展生产力。”他认定，我们之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并指明我们的任务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如这年3月他在南京干部会议上说，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这同中共八大作出将党的工作中心从革命转变到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个正确认识后来未能得到坚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关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由于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观察和处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仍然习惯于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表现，特别是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两条路线、甚至两个阶级的斗争，从而轻易地改变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到1959年错误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再到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斗争，都反映了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这样做，不但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受挫，而且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应当看到，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正确认识并学会妥善处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以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

但又绝不能因此而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根本任务。

第三，要尊重客观规律，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如前所述，我们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发生的失误和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大的失误和挫折，是应当避免也是可以避免的。这十年经济建设中发生的严重失误，是同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作用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发现、把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并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① 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② 在这期间，他对不能剥夺农民、“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要综合平衡等的论述，都反映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总之，我们要善于学习，包括向自己的经验学习。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

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们
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
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①正是通过这种学习，使我们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能够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338页。